



体育，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南京路上好“东体”



棋哥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毛泽东

《东方体育日报》创刊20周年，“东体”的体育传承何止20年。

在我的记忆中，《东方体育日报》成长轨迹，就像是我军发展历史一路向前。同样是“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从《体育导报》——《新民体育报》——《东方体育日报》“同志们整齐步伐”走到今天。

1990年，北京京西宾馆，借调来参加1990年亚运会体操比赛的上海电视台体育部杨旭峰解说素材中，就有一段关于上海体操运动员樊迪的背景资料最详细，这也为樊迪夺得1990年亚运会两枚金牌转播提供了精彩花絮背景。

1997年，中国国脚队在大连金州参加世界杯亚洲区十强赛，《体育导报》这时已更名为《新民体育报》，是戚务生率领的国家足球队、中国足协新闻办最可以信赖的主流媒体之一。《新民体育报》记者何斌采访上海国脚范志毅、毛毅军、吴承瑛的篇篇报道，让海派体育文风有口皆碑。

当中国足球队打进2002韩日世界杯，2002年《东方体育日报》在上海滩，在长三角竖起大旗，东方风来满眼春。

我作为一个理工男，业余体育专栏作者，大学一毕业就在体育界干活。尽管业余写作，但在很多报刊上都开过专栏，坚持时间最长的应该就是在《东方体育日报》。

黄庭坚在《东坡先生真贊》中说：“东坡之酒，赤壁之笛，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给“东体”写专栏就是这点好，不设选题限制，允许自由思想、幽默风趣、嬉笑怒骂的个体风格发挥，这也是长期喜欢在《东方体育日报》写专栏很开心的一点。

记得雅典奥运会后陪魏纪中先生去上海，上海体委领导祝嘉铭请我们在南京路一家饭店小聚。祝嘉铭谁啊？我爹都是他的球迷。当年中国男排主攻手、中国男排主教练、亚洲排球联合会教练委员会主席、上海体委副主任……那年月，绝对的上海滩体育巨腕。仰视之中祝嘉铭对我说：“你在《东方体育日报》专栏的一个观点很有新意，就是那篇《只要隔着网子的比赛中国人都行》，哈哈，不仅是女排、乒乓球、羽毛球，还有李婷孙甜甜的网

球都拿了奥运会冠军……”

哎呦嘿，当时我那虚荣心得到巨大满足，祝嘉铭都看咱“东体”专栏。

上海金山区，如今已是风景如画的好地方。那年我去上海金山筹备“世界沙滩排球巡回赛——上海金山站”，金山区还只是一片希望的田野。金山的海水是巧克力颜色（时任金山区委书记李毓毅语），金山的海滩也是泥塘烂地、荆棘丛生、荒芜凄凉。但在给《东方体育日报》的专栏里写下了金山区老百姓最自豪的“先有金山卫，再有松江府，后有上海滩”的上海城市发展史，让金山的朋友们至今谈起起来还高兴。

可能就是因为《东方体育日报》对金山区这15个字历史的描述，金山区以世界沙滩排球赛为切入点，跟上了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发展步伐。

之所以喜欢《东方体育日报》，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东体”对体育运动、智力运动、电子竞技的包容。2011年国际智力运动联盟希望把“德州扑克”纳入英国曼彻斯特“国际智力运动会”的比赛项目。但在许多人的传统意识里，“德州扑克”出身不好，它是来自美国拉斯维加斯有赌博色彩的一项比赛，谁敢公开写它是健康的智力运动？

投石问路，还是《东方体育日报》。

“东体”这点特好，不论观点怎么样，但允许百家争鸣。直到今天，许多打德州扑克的朋友都说我在《东方体育日报》发表的三篇专栏《德州扑克，想说爱你不容易》《加州牛肉面，德州扑克牌》以及《德州扑克的“赌”与“博”》，是他们在主流体育媒体看到能公开谈“德州扑克”少有的文章。观点可以争论，但能让“德州扑克”出现在大上海的报纸上，显出“东体”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海纳百川气量。

李白有诗：“日出东方隈，似从地底来。”

早年听歌“东方之珠，我的爱人，你的风采是否浪漫依然……”总以为“东方”二字的定位是香港。直到有一年去上海南京路七重天看望好友穆端正，他说正在筹办上海“东方电视台”。那时突然感到“东方”与上海的紧密关联。

《东方体育日报》20年了，它已经成为我们体育生活的一部分。疫情暴发前曾去上海见一位未曾谋面的朋友，约会时间、地点、暗号就是“下午4点，上海外滩陈毅元帅雕像旁边，左手拿一份《东方体育日报》”。我在南京路步行街报摊买了份《东方体育日报》，心中透着“南京路上好东体”的豪迈，走向黄浦江边……

愿《东方体育日报》越办越好，为“健康中国”而“风景这边独好”。



葛爱平

说起《东方体育日报》，只要喜欢体育的人应该都知道。但要说起“东体”的前身，知道的人可能不多了。

1990年，位于南京西路的上海市体委（现在称上海市体育局），低调地开张了一份报纸：《体育导报》。

这家报纸办在体委大楼里，报纸的属性自然也很明了，这是市体委办的机关报。

在当时，体育事业蓬勃兴起，体育新闻也颇受关注，上海市体委开了这个头，其他省市也竞相跟上，一时，各地体育机关报办了不少。

群起涌现的体育报纸，良莠不齐，而体委机关报，很快便现颓势，因为是机关报，报道的重心离不开体委领导的一举一动，会议新闻垄断了要闻，领导讲话、机关开会成了雷打不动的头版内容，而读者关心的球队动态、球星动态则被排到后面，或者很少出现，久而久之，这样的机关报影响力日下，生路都成了问题。

《东方体育日报》的前身《体育导报》。因为摆脱不了“机关报”的印记，《体育导报》实际上也影响力式微，对本地的综合性都市晚报《新民晚报》的体育报道无法构成挑战。而此时，新民晚报社则已经发展到自这家报纸诞生以来的最好时期，日发行量最高达180万份。当时的《新民晚报》是一家经营和采编在上海和全国都数一数二的报纸，拥有很大的自主权。

专业供稿三十年

晚报》的体育报道无法构成挑战。而此时，新民晚报社则已经发展到自这家报纸诞生以来的最好时期，日发行量最高达180万份。当时的《新民晚报》是一家经营和采编在上海和全国都数一数二的报纸，拥有很大的自主权。

而为了能够让报纸做大做强，需要扩大采编和经营范围，而这时《体育导报》正好日子难过，当时的《新民晚报》手里有钱正愁无处投资，于是便和上海市体委一拍即合，出资买下了《体育导报》，并更名为《新民体育报》，当时一起收购的还有市体委属下的一本围棋杂志，后更名为《新民围棋》，主编便是鼎鼎大名的原围棋国手曹志林。

《体育导报》归入新民晚报社，改名为《新民体育报》，与新民晚报体育部分立，但内容上需要体育部大力提供。当时我在体育部任记者，每次出差，都受命要为《新民体育报》写稿。

坦率地说，当时出差一次，发稿量很大，主要精力都放在体育版上，再为《新民体育报》写稿，确实有内容枯竭之感。好在《新民体育报》不是日报，还有回旋的时间，再到后来也找到了“对付”的办法。体育版因为版面有限，人物和评论文章都掌握在800字以内，如果过1000字编辑的眼睛要瞪出来了。《新民体育报》

则有充足的版面供应，于是，便把体育版“割”下来的内容堆到《新民体育报》上，一篇文章写上1500甚至2000字都有版面供应。于是也就形成了习惯，一身二职，短文供体育版，长文给体育报，也能应付得不慌不忙。

因此，《新民体育报》给我的职业印象，也就是可以潇洒写长文的地方。

说来惭愧，我也算是1982年复刊的《新民晚报》第一批体育记者，又是《新民体育报》的第一批兼职合作者，但我与《新民体育报》的合作，还不如之后的《东方体育日报》，到现在这么些年来，几乎每周写一篇评论。虽然文章不算多，但是写业余稿件，却如此定时坚持，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还是少有的。但是比较这一家报纸而言，这又是根本摆不上台面。

最近这些年来，体育潮已经退去，《东方体育日报》能够一直坚持到现在，并且仍然勃勃有生机，办报和搞各种体育活动，为报纸广开财路，增加收入，活得很强，真的是难能又可贵。

在《东方体育日报》20岁生日之时，允许我献上最诚挚祝贺：二十才年轻，正是活力四射，希望无限之时，远大前程还在前面呢！



马德兴

如果不是“东体”编辑提醒我《东方体育日报》创办20周年了，是否可以写点什么，我压根就没有意识到：从当年的《新民体育报》改成《东方体育日报》之后一晃都已经是20年过去了。作为一个从给“新体”写稿之人到现在定期为“东体”撰写专栏之人，突然感慨万千，蓦然间还真不知该从何说起或写起。

30年前，当中国足球在红山口会议的推动下开始迈向职业化时，国内的体育媒体界也迎来了第一波高潮。那个时候，我前前后后在全国大大小小各种体育专业类报纸上发表过文章的就不下20家，《新民体育报》就是在那个红火的年代中应运而生的。而且，那个时候的《新民体育报》借助于《新民晚报》的力量，在北京还专门设有办事处，并有专人负责约稿。大学刚刚毕业不久的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与“新体”打交道的，并逐渐成为了常客。

或许是从事足球记者这个行业久远之故，也或许是如今依然还坚守一线之故，上个世纪90年代就在

从匿名到真名

为“东体”前身的《新民体育报》写稿，如今依然还继续为“东体”撰稿。

只不过，那个时候因为自己有工作单位，且存在着所谓的“同行是冤家”的情况，作为同类体育媒体的记者，我当然不便直接以真名在其他竞争对手媒体上公开发表文章。所以，我印象很深，那个时候几乎是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换一个笔名。在“新体”前前后后差不多用了近20个笔名。这其中，要说记忆最深的，恐怕非“兰天、白云”莫属。

【注：当时署名看上去是两个作者，实际就只是为制造假象。】正是以这个名字发表的《中国足球十问》一文，引发了一场可以在中国足球新闻史上乃至整个中国体育新闻史上留下一笔的大事件，我也因为这篇文章彻底丢掉了公职，以致随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再也没有为“新体”撰稿。

而今重续前缘，不得不感慨现代媒介的发展与传播方式的改变。不得不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手机的广泛运用，媒体的传播渠道、手段与方式已经与《新民体育报》所处的那个年代发生了颠覆性的革命，纸媒的日子已经越发不好过。也正因为此，很难再用先前的

“同行是冤家”来作为评判的标准，更多地恐怕还是在顺应潮流的同时，更注重“抱团取暖”。于是，纸媒出身的我已经不再强求所谓的署名问题，反而是大大方方地写上了自己的真名。

不过，令我感慨的是，也许是时代变了，也许是环境不同了。20多年前的《中国足球十问》一文中，那十个问题放之今日或许依然还有现实意义，而且依然也难以找到答案。但是，类似这样的尖锐文章，或许是已经没有了再现的可能。

现在的传媒需要更多地传播正能量，而且，随着传播途径与方式的变化，媒体已经不再强调“在现场”、不再强调“深入调查”，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大大拉低了传媒的门槛，但凡是一个普通人，只要号称自己亲眼所见，便可以“媒体人”自居，利用各种商业平台传播出去。因为随着传播途径与方式的改变，评价体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流量”取代了“深度”、取代了“精度”。于是，在“快餐”般的海量信息之中，所谓的“深度稿、精度稿”很快便被冲入底部。

面对如今的时代与现实，纸媒是否还有自己的生存空间？我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但愿“东体”在诞生20周年之际，依然还记得自己的初心。